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题 目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形式

作 者 齐 彪

专 业 中共党史

1991年5月30日

所 在 单 位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本校生填教研室)

指导教师或推荐 何 理 教 授
人 姓 名、职 称

学 习 期 限 三 年

地方实力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绪 论

地方实力派是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政治武装集团，亦称地方军阀，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自辛亥革命后产生的各地方军阀，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雨中生生灭灭、此消彼长，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有桂系、晋系、冯系（西北系）、东北系等。地方实力派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大多数同国民党中央系（蒋系）属于同一阶级范畴，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居于统治阶级地位，都是国民党新军阀。但二者又有区别，地方实力派主要代表地方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地方性特征。大多数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是集党政军财大权于一身的一方诸侯。他们掌握一支地方性的私家亲军，据有一方地盘，拥有大多数地方官僚资本，操纵地方经济命脉，以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对于以实现独裁统治为己任、要求四海之内绝对臣服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不能容许的，蒋介石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对地方实力派实行排斥、削弱和吞并的政策。地方实力派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二者的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地方实力派为抵抗蒋介石的排斥、削弱和吞并，有可能和中国共产党结成暂时的同盟，为中国共产党利用统治营垒内部矛盾，争取地方实力派提供了条件。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地方实力派在中国两大敌对的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央）的斗争中游移于

两者之间，或联共，或附蒋，或保持中立，成为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一颗份量不轻的砝码。

“九一八”之后，国（中央）共两党在对日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主张。蒋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其实质分歧是妥协内战还是团结对外。处于夹缝中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对国（中央）共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力量还不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更为重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表明，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地方实力派先于国民党中央接受，由附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形成我党与地方实力派的局部合作，进而推动蒋介石向联共抗日转变，把局部合作推向全面的合作。地方实力派是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合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拟就地方实力派向联共抗日的转变以及对国（中央）共两党策略的影响作一肤浅的探讨，说明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九一八”后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演变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蒋介石联合桂、冯、阎等地方军阀镇压共产党、叛变革命的结果。但桂、冯、阎等并没有从助蒋反共中捞到好处。蒋介石在1928年10月登上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后，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独裁、“统一”的目的，便把昔日的“战友”、金兰弟兄作为“革命的对象”来对待。经过连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除亲蒋的东北系入关助蒋得到一定扩张外，其他各主要实力派均受到很大伤害。冯系作为一个完整的武装集团已不复存在；阎系虽得以幸免保留下来，但阎本人不得不逃往大连避

难；桂系退往广西一隅。蒋系确立了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地方实力派虽有反蒋之心，但无反蒋之力，与蒋介石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得以缓和。

九一八事变后，由民族危机而造成的蒋介石中央政权的危机，为地方实力派重振力量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它们提出了不同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政治主张。华北事变后，地方实力派进一步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抛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共抗日。这既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的必然结果，又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斗争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和继续。

1、“九一八”至华北事变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剿共”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统治营垒的分化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的大举入侵面前，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相标榜，对内反共内战，对外抱不抵抗主义，致使民族危机日深。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丢了东四省，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势力侵入关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旧仇新怨，一齐迸发，国民党政局进入新的动荡时期。地方实力派为重振雄风，开始和蒋介石进行新的较量。这种较量集中反映在对抗日和“剿共”两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主张联共抗日；而大多数主张抗日、“剿共”并重，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斗争。

主张联共抗日者，以冯玉祥为首的原西北军一部和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为主要代表。冯玉祥在“九一八”后向我党承认了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错误，表示愿在我党的政治帮助和合作下举起抗日旗帜，反蒋抗日。力争西北军东山再起。长城抗战失利后，1933年5月，冯玉祥重招吉鸿昌、方振武等原西北军旧

部，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光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把日寇逐出察东，同盟军声势大振。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阻挠，进行了一二八抗战。其后，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在与红军多次交手失利后，蒋、蔡感到“剿共”没有出路，而不剿又为蒋介石所不容，决心另起炉灶，随与红军签订协定，联合反蒋抗日。蒋、蔡联络国民党一部分势力，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这两起联共反蒋抗日事件，虽属少数地方实力派的有限行动，但其影响非常之大。他们公开站出来反对蒋介石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统治营垒中首先分化出来，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斗争，代表着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演变的基本方向。蒋介石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法对付这两支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和日寇的联合夹击下失败，冯玉祥未能借助“九一八”后的大好时机而能重振西北军，他由西北军的首领逐步成为国民党抗日民主人士。十九路军这支闻名于世的抗日队伍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下覆亡，福建人民政府夭折。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伎俩的重演。

抗日与“剿共”并重的主张，是1933年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实力派首领在广州会谈时提出的。虽没有放弃“剿共”，不同于冯玉祥等人的联共抗日，但强调了抗日，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主张，虽为两广所首倡，而实际上，各主要地方实力派，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均抱此种政治态度。就两广本身来说，他们声援一二八上海抗战和热河长城抗战，对热河长城抗战还派出先遣队增援（未达）；强烈谴责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等抗战部队的折台政策。同时，两广又都参加了对江西根据地红军的“围剿”和追击。简系在

“九一八”期间曾与日本勾勾搭搭，但到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阎锡山派出晋绥军精锐商震32军和傅作义59军参战，在冷口、怀柔等地重创日军。当长城一线吃紧，平津危急之际，有消息传说蒋介石将放弃平津地区，晋系力主誓死固守平津。1933年5月17日，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致电蒋介石，陈说厉害：“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州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此也。或曰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提出“其困难万倍于不退平津”，要蒋介石“千万注意”。^①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则看作是他经营山西的心腹之患。在他1932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写道：“共产党徒及捣乱者流，则蓄意破坏，遇事挑拨，均足以阻碍建设之进行。”^②仅在他上台前后，就枪杀包括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在内的共产党员9人，8人被判无期徒刑，25人被处5—15年有期徒刑，还查封了进步组织太原学生抗日反帝同盟会，100多人被通缉。桂、阎等实力派的抗日“剿共”，反映了在民族矛盾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们与蒋介石既有斗争又有调合的关系。他们的抗日行动和要求，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与蒋介石抗衡的需要。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扩大了政治影响，巩固了政治地位。蒋介石对他们不敢轻举妄为。阎锡山利用太原爱国青年学生“一二、一八”反蒋抗日事件，把蒋系势力从其地盘上驱逐出去。两广军阀也曾利用抗日作文章一度逼蒋下野。蒋介石对其“不轨”行为，大多是睁一只

① 《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呈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电》（1933年5月17日），《革命文献》第38辑。

②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63页。

眼，闭一只眼，蒋本人对此亦曾自我解嘲。1934年2月11日他和汪精卫联合发表的通电中说，几年来除对闽变“不能不忍痛戡定外”，中央“对于各地方间偶生差池，无不务为容忍，委曲求全。”^①桂、阎等实力派和蒋系势力是无法匹敌的，作为地方政权，在政治上、财政上很大程度都受制于蒋系中央，与蒋介石保持一定的统一性，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部分赞成，又是必要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发展，不仅对蒋介石构成威胁，也对阎、桂等实力派构成威胁。双方在抗日上的矛盾，在“剿共”问题上得以缓释和谅解。正因为地方实力派于“剿共”问题上对蒋介石的追随，蒋介石才能对其“不轨”行为采取“容忍、委曲求全”的态度。阎、桂等就是利用抗日与“剿共”并重的两面手法，使其实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九一八”到华北事变，是阎、桂等实力派发展自身力量的黄金时间。阎锡山制定十年建设计划，鼓吹“造产救国”，修建同蒲路，发展地方官僚资本，到1936年其资本额已达25,000万元，大力整顿军队，从1932年到1936年整顿军队的费用即达9,966万元。广西李、白制定“广西建设纲领”，整理省政，发展经济，清除匪患，实行民团制度，设兵工厂，创立空军。李宗仁后来回顾说：广西“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②另外，粤系在华南、宋哲元、韩复榘等部在华北，势力都逐步强大。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在华北事变前亦抱抗日“剿共”的两面主张。东北军在“九一八”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举国皆骂。到锦州战役时，张学良开始觉醒，表示要“竭尽忠诚，誓守城土”，并“飭前方将士，严行抵抗”。热河长城抗战之时，张学

① 《国闻周报》卷十一，九期。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42页。

良公开宣布放弃不抵抗主义。他在1933年1月18日联合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26人发出的巧电中对执行不抵抗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当事变之初，我为尊重盟约，托请国联裁判，冀以正谊之主张，期获公理之实现。不图日人贪饕，得寸进尺，我讲公理，彼持强权，我愈让，而彼愈争，时愈久而变愈烈。”指出，对日本的侵略“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表示“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山河，雪莫大之耻辱；倘不幸不成，亦可振我军誉，扬我民族精神。”^①热河长城抗战失利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了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反攻热河的主张，但遭蒋拒绝。张学良还在各方面支持了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的敌后抗战。其抗日的态度是鲜明的。同其他实力派一样，张学良亦主张“剿共”。张学良1934年1月回国后，即于2月7日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总司令职，东北军精锐王以哲67军以及何柱国57军共11个师悉数从华北国防前线南调鄂豫皖，“围剿”红25军，占整个东北军半数。但张学良东北军抗日“剿共”的目的与阎、桂等实力派不完全相同。日本的侵略，东北军受害首当其冲，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丢弃了父老乡亲，祖宗庐墓，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因此他们抗日的愿望是真诚的，不存在对付或应付蒋介石的意义。他们对蒋介石牺牲东北的屈辱妥协的方针颇为埋怨，但又认为抗日必须有蒋介石的领导，全国力量的支持，单凭东北军是不行的。为了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东北军支持了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事实上，蒋介石向抗日的转变，不是能靠支持他“剿共”政策所能实现的。这种以支持“剿共”来换取抗日的想法幻想的成份多，与事实背离

① 《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高震、宋哲元等北方将领的通电》（1933年1月18日），转自《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54页。

大，也最容易破灭，东北军先于其他实力派从抗日“剿共”转向联共抗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地方实力派抗日、“剿共”并重的主张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并未下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抗日与“剿共”从根本上来说是背道而驰的，要“剿共”就不能抗日，要抗日就必须停止“剿共”。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蒋介石损人利己政策的强化，地方实力派放弃“剿共”政策，转向联共抗日，是必然的政治取向。

2、华北事变后地方实力派向联共抗日的转变

华北事变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与“剿共”两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深化，逐步把抗日与联共联系起来，彻底抛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抗日“剿共”转向联共抗日，与共产党化敌为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日本的进一步扩张给华北实力派造成的严重危害，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实施向中国本部扩张的图谋。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冀察主权实际上落入日寇之手。其后，日本大肆收买汉奸，发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华北的实力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被撤河北省主席职，东北军被赶出“第二个故乡”——河北省；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省；阎锡山晋绥地盘顿失东部和北部屏障。日寇对绥东的进犯，直接进入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再进一步，就会把阎赖以生存的山西老窝一脚踢翻。华北事变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恶果。东北的失陷，热河长城的失守，蒋介石拿张学良作了替罪羊，冀察两省不战而失，华北危急，蒋介石就难逃其咎了。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对日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趋于尖锐。宋哲元在被撤察哈尔省主席职、二十九军被逼出察省的

当口，气愤地说出“谁再相信蒋介石，谁就是傻瓜混蛋”^①的话，毅然违背蒋介石南调其“剿共”的命令，乘华北混乱之际，指挥二十九军控制平津，不愿再做蒋日妥协的牺牲品。阎锡山从华北事变中认识到蒋介石靠不住，提出了“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最终怎么办？”^②的问题。他所倡导的“守土抗战”的主张，含有对蒋介石表示失望的意思。既然你蒋介石不抵抗，不顾我们晋绥，我们只有靠晋绥的力量自己抗，自力更生了。张学良对东北军再次不战而退、被调往“剿共”前线，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愤慨，希望给他“变换任务”，去抗日，而不是“剿共”内战。^③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提出了与蒋介石“安内攘外”根本对立的主张，即“攘外安内，就是对外就能安内”，^④先攘外而后安内。他“向南京政府建议，请变更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⑤远在南方的两广实力派，虽未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但唇亡齿寒，对敌日深而国土日蹙深感忧虑，敦促蒋介石放弃妥协政策，指出“中央忍辱负重之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叫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声明“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于人”，^⑥提出要“守土抗战”，坚决回击日寇的入侵。

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相反，中国共产党主张对日寇坚决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公开对日宣战，领导东北抗联坚持敌后抗战，派出抗日先遣队，1936年春又东渡黄河，准备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日本对中国共产党是恨之入骨的，多次提出要与南京政

①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2页。

② 王生甫、任嘉耀：《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6页。

③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第16页。

④ 《张学良为历史慷慨证言》，《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7日。

⑤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第16页。

⑥ 《李宗仁回忆录》（下）1980年广西版，第669页。

府“共同防共”，这固然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但同时也包藏着消灭中共的祸心。这不可能不对地方实力派产生较深的影响。阎锡山在红军东征回师后就曾说过：“东北失守，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抵抗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①在寇深祸亟的情况下，蒋介石不抗日，联合谁抗日，怎样才能使蒋介石转向抗日，是值得所有地方实力派深思的问题。

第二，蒋介石利用“剿共”排斥、削弱和吞并地方实力派，使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有了进一步认识。

如前所述，“九一八”后，阎、桂等实力派以抗日“剿共”和蒋介石周旋，其势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对此蒋介石是不愿意看到的，深有尾大不掉之痛感。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后，没有践行他“先剿共，后抗日”的诺言，把注意力转向抗战，却把“和平统一”各地实力派提到了议事日程。1934年11月12日蒋汪联名发表感电公开表示，红军已经失败，安内的反共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而统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则成为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确立“共信互信”实现“和平统一”的五项原则，并于1934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得以确认。要求各地实力派“本休戚与共之真诚，遵国家整个之政策，怀当前严重之困难，遵法奉命，一扫往昔割据与形同对立之形势，一致努力，以期蜕变中古时期封建之遗习，而创造三民主义新时代整个之国家。”^②蒋介石“和平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地方实力派对其反共政策的追随，使地方实力派和红军作鹬蚌之争，两败俱伤，乘机向地方实力派所统辖的那些他认为“革命势力未达到”的地区渗透，最终取而代之。使用这种手段，蒋介石

^① 王生甫、任嘉敏：《牺盟会史》，第36页。

^② 蒋介石、汪兆铭：《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案》（1934年12月12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49—250页。

先后攫取贵州和四川的地盘，派大批中央军、参谋团别动队等进驻四川，在成都设立复兴社、中央军校分校，在重庆设行辕，要把四川建设成为“民族复兴基地”。蒋介石对桂系也想施展假途天讷的伎俩，李、白认为蒋介石“居心极为阴险”，^①因此采取了既反共又防蒋的方针，不让中央军进入桂境。红军移师陕北后，蒋介石集团和两广实力派的“中间地带”消失了，两兵相接，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终于引发了抗日反蒋的两广六一运动。1936年5月，蒋以帮助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为由，把十个师的中央军调入山西，赖着不走，策划“河东独立”，向晋绥军政机关渗透，阎锡山发出了“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感喟。蒋介石对帮过他大忙的东北军亦毫不手软，让东北军反共打头阵，经崞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损兵折将达三师之多，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下令取消番号。甚至张学良为阵亡的师长请求十万元的抚恤金，也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张学良悲愤感叹道：“我人名望，已经降低到不值十万元钱”，^②担心如此下去，“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③。抵御蒋介石的排斥、削弱和并吞，是地方实力派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华北事变前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反共“剿共”的追随，固然缓和了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等问题上的矛盾，但这种缓和，却又因蒋介石把“剿共”作为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工具，而又走向尖锐，“剿共”问题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矛盾斗争新的集合点。地方实力派不愿继续充当蒋介石反共“剿共”的工具。

第三，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要求地方实力派在联共抗日和附蒋反共二者之间重新作出选择。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51页。

② 《西北大学历史系现代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91页。

③ 《陈诚1936年9月20日蒋介石电》，《革命文献》第94辑。

华北事变后，悲愤愈甚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抗日救亡运动的道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议华北伪自治运动，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敦促蒋介石厉兵秣马，逐寇救国。之后，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济南、南京、南宁、天津、安庆、太原、开封、重庆等各大中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游行示威和集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形成不可抗拒的抗日救亡洪流。这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觉悟的反映！地方实力派反共“剿共”受到了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不能不深长思之，是随历史潮流而行，联共抗日，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附蒋反共，何去何从，何轻何重，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

民族危机的加深，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抗日、“剿共”问题上矛盾的尖锐，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是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条件，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对地方实力派由反对而转向争取的政策，却是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关键。“九一八”以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看不清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的情况，抽象地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坚决对立这一原则出发，过份强调中国各反革命派别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忽视中间力量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变化，错误地将中间力量作为革命打击的对象。华北事变后，我们党审时度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

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利益捐弃前嫌的坦荡胸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接近抗日前沿地带。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同各阶级、各派别、各武装部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1936年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逐步把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改变为更易于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中间派别接受的逼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且已成为全国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在国民党统治营垒的各实力派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呢？还是执迷不悟继续和红军对抗，终被抗日的洪流和觉醒的人民及下层官兵推翻呢？促使地方实力派重新考虑和确立与中共的关系，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用阎锡山的话说：“华北的事，应找着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路，才能迈步。”^②这种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路，只有联共抗日之路。只有联共抗日，才能外抗强敌的入侵，内御蒋介石的削弱政策，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高潮的到来。联共抗日成为华北事变后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变化的基本趋势。从1936的上半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联络下，中共与西北、西南、华北等实力派建立了多种联系。

首先是西北的大联合。张学良东北军与红军三次交锋后，就设法与中共建立联系。1936年1月，中共通过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将领的公开信，表达了红军愿与东北军合作抗日的意图。其后

①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16页。

② 《牺盟会和决死队》，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96页。

通过释放俘虏高福源，两军建立了正式联系。双方经过多次会谈，在抗日及对蒋方针等问题上逐步形成共识。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代表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1935年底，红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通过汪锋等人取得联系。1936年5月双方达成共同抗日、互派代表、互不侵犯、建立交通站等四项协议。同时在中共的斡旋之下，东北军与西北军也消除了误会，取得了谅解。1936年10月，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表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①，标志着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的确立。西北的大联合，坚定了张、杨联共逼蒋抗日的决心，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准备了条件。

其次，与西南桂、川等实力派建立了密切联系。两广六一运动后期，红军派云广英到南宁，表明了中共对解决两广事变的立场。李宗仁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接着李、白派钱寿康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即认为与桂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并指出：“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②通过张曙等人的活动，四川刘湘也与中共达成停战协定，把反共政策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八字方针。四川与广西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双方都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情况下，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刘亚休赴广西，与李、白的代表、中共的代表共同签订《川桂红协定》，主要精神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还打内战，就联合起来反蒋。”^③

①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71页。

③ 邓汉祥：《刘湘与邓汉祥的勾心斗角》，《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再次在华北方面，中共提议“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包括宋哲元二十九军、阎、傅晋绥军以及山东韩复榘部队等，虽未能实现，但与中共关系明显改善。中共与宋哲元密使往来，信函不断。宋哲元对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由原来的对立、压迫改为“不阻碍”、“宽大为怀”的态度对待之。韩复榘在统治山西后期，济南“聚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一些共产党员”，韩表示要“跟共产党合作。”^①在晋绥，我党通过由薄一波主持下的牺盟会，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抗日的模范地区，促进了华北地区抗日斗争的进一步高涨。

联共抗日是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变化的基本趋势，并不是说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反共行为。地方实力派囿于其阶级、集团利益，他们向抗日联共的转变，带有明显的动摇性和两面性。阎锡山联共不忘反共，一方面请共产党到山西来工作，另一方面又为共产党在山西的工作设置障碍，对共产党是明联暗不联，上联下不联，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人民的觉醒会影响他“土皇帝”的地位。东北军与我党建立统战关系后，其何柱国部还“屡与红军为难”。特别是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以后，地方实力派的动摇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地方实力派联共抗日的立场与蒋介石妥协内战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同样由于阶级、集团利益的局限，就使这种对立具有一定的限度。两广与蒋介石的妥协；阎锡山对蒋暗反明不反，都集中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中共争取地方实力派的过程，即地方实力派转向联共抗日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策略，才能巩固和发展

① 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61页。